

書名：《守望傳統的價值——陳來二十年訪談錄》

著者：陳來

出版：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18年9月

頁數：328頁

2018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之際，作為在此時代中成長起來的儒學大家，陳來先生多年來一直在儒學和傳統文化研究領域筆耕不輟，並極力倡導重新發現傳統文化的價值，促進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復興與發展。其近作《守望傳統的價值——陳來二十年訪談錄》生動記錄了他二十餘年的思想歷程。本書通過訪談等形式，真切展現了陳先生堅定地儒家文化價值立場，以及多年來對傳統文化不懈地探索。該書涉及的主題廣泛，既收錄有陳先生學術儒學方面的相關成果，亦記錄了其對文化儒學的參與。¹ 從某種程度上說，該書的出版代表了一個儒家學者對時代的回應。閱讀該書，讀者可以窺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傳統文化研究的走勢，並瞭解儒家思想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價值、作用、定位，以及儒家思想在東亞地區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意義和可能的貢獻。

1 陳先生曾指出當代有三種在場的儒學，即學術儒學、文化儒學和民間儒學。所謂學術儒學，陳先生道：“什麼是學術儒學的文化呢？就是對傳統儒學進行深入研究，把握儒學歷史發展演化的脈絡，來梳理儒學理論體系的內部結構，闡發儒家的各種思想，這套系統我叫做學術儒學。”而所謂文化儒學，據陳先生介紹：“近30年來，我們有很多文化思潮與文化討論跟儒學有直接關係，比如，討論儒學跟民主的關係，討論儒學跟人權的關係，討論儒學與全球化的關係，討論儒學與現代化的關係，討論儒學與文明衝突的關係等等，當然我們今天也在討論儒學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關係。在這些討論里，有很多學者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場，來表彰儒學價值的積極意義，探討儒學在現代社會發生作用的方式，在這一方面闡述了很多有價值的文化的觀念和理念。這些討論，我覺得它也構成了一個儒學的特殊的存在形態，我就把這個形態叫做文化儒學的形態。”參閱陳來：《百年儒學的發展與起伏》，該文為陳先生2010年6月9日在鳳凰大講壇的講座記錄。

全書除代序外,共分三個單元,即第一單元“社會轉型期的反思”收錄 11 篇文章、第二單元“中國世紀與中國價值”收錄 16 篇文章,以及第三單元的 6 篇“訪談錄”。三個單元所收文章各自獨立,但又在整體上遙相呼應,共同圍繞著儒學價值傳統在現代社會的意義這一主旨展開。統而言之,該書既在宏觀上對中國近百年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實踐活動作了回顧與前瞻,又以傳統與現代、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辯證聯結為核心,深入剖析了中國的社會轉型、文化結構的調整、學界思維的定勢以及儒家哲學體系的建構等大問題,在行文上則做到了現實性與理論性、學術化與通俗化相結合。

此書雖名曰“二十年訪談錄”,實則書中思想常可追溯至八十年代。陳先生曾自稱:“從 80 年代到現在,不管是在傳統文化最低潮的時候,還是近些年來的‘國學熱’中,我始終不變的一點是,對儒學作為一種價值理性的文化形態,及其對現代化的作用,始終寄予完全的信任和理解。”²正是本著這份執著,自 80 年代以來,在每個時代的關鍵時刻,陳先生始終站在時代文化的中心,來代表儒學和中國文化的立場,回應各方面的批評和挑戰,替傳統文化講話。這也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即他是一位保守主義者。但陳先生的“保守”只能稱為一種文化保守主義,有別於政治保守,且和他對文化激進主義的批判分不開。正如陳先生在《20 世紀 90 年代訪談錄》一文中所說:“社會發展必然帶來文化上的轉型。20 世紀以來,中國有過幾次文化轉型。在每次轉型的過程中,都會出現文化激進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兩種傾向。我覺得這兩種傾向在社會變遷中都需要,缺一不可。沒有文化激進,社會變遷就缺少推動力;而沒有文化保守,就會缺乏穩定性。但是歷史前進往往會偏向一邊。例如五四時期偏向激進,20 世紀 80 年代‘文化熱’時激進的思想也佔主導。我主張這兩種傾向應該保持一種合理的張力,不能太偏向一邊。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年來我的工作都是批評文化激進主義。”(第 7—8 頁)

丹尼爾·貝爾嘗稱其在政治上是自由主義、經濟上是社會主義、文化上是

2 陳來:《“文化熱”中,文化保守主義的價值》,載《三聯生活週刊》“改革開放四十年”專刊,2018 年 10 月 8 日,總第 1007 期。

保守主義。陳先生引其例，認為自己的文化觀也是三種形態的結合，即既是開放的，也是批判的，同時也是保守的。而這種文化觀正是其儒學思想的基礎。本著這種既開放又批判同時也保守的態度，陳先生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有著獨到的理解，他道：“單純說‘重建’還遠遠不夠，因為重建有‘恢復’的意味，而傳統人文精神中有其精粹的一面，也有其不適用於社會發展的一面，所以對它既要有傳承，又要有轉化、創新和調整。”（第 11 頁）又道：“傳統並不是我們可以隨意丟棄、摒除的東西，拒絕或拋棄傳統是不可能的；傳統是文化對於人的一種作用，而傳統對於人的作用和意義，又依賴於人對傳統的詮釋、理解。因此，傳統的意義更多地取決於我們如何在詮釋的實踐中利用它，如何創造性地傳達其意義。”（第 111 頁）此類論說甚為精道，頗具啟發意義。

2016 年陳先生在清華人文講壇曾作“守望傳統的價值”講演，後完善整理成文字稿，在社會上廣為流傳，本書第二單元的第一篇文章即為此整理稿。而本書之書名亦是取自這次講演的標題，此正可見出該文在全書中的分量。陳先生在該文中細緻分析了 20 世紀出現的全盤反傳統思潮的四種錯誤取向，即：以富強作為判斷文化的唯一標準、以“科學”“民主”作為判斷文化傳統價值的根本標準、把文化看作意識形態、價值理性視野的缺失。由於受到這四種錯誤標準影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受到了極大損害。陳先生指出：“從過去一百年的歷史來看，形而上學地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在學理上不能成立，在實踐上產生的直接惡果就是大大傷害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使中華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文化、價值、精神的全面失落，加劇現代化秩序建構過程中的混亂、痛苦，甚至加劇政治、經濟危機，從而削弱了中華民族面對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困難的承受力和戰鬥力。”（第 108 頁）

由於受五四以來文化激進主義的影響，以及馬克斯·韋伯社會學理論的引入而引發的儒學與現代化的討論，學者們常常囿於一元化的思維而責難儒家社會為什麼未能產生資本主義？在陳先生看來，這種責難在學理上是無法成立的。陳先生指出：“韋伯關於資本主義產生的觀點是基於發生學的研究，一種事物的發生與再生、模擬過程並不同質。”（第 8 頁）事實上，韋伯自己也曾用產生與同化的區分，來說明一種文化不能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並不等於它

沒有模擬、學習和同化資本主義的能力。陳先生以“後儒家文化圈”的東亞國家和地區(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台灣、香港)為例,指出這些國家和地區皆未經過一個與傳統決裂的過程,但都實現了經濟的騰飛。這些事例也從反面證明了,“傳統不必然是中國現代化的根本障礙,現代化可以通過不摧毀傳統的方式實現,傳統的調整和持續與制度的改革和建構,可以整合在同一過程之中。而破壞傳統不僅不必然意味著現代化的實現,而且可能導致價值結構的解體和文化認同的失落,損害現代化秩序建構過程本身。”(第 110 頁)可以說,陳先生的高明之處,正在於其能用韋伯理論還制西化主義者。

針對學者們的一元化思維,陳先生早在 1988 年即寫過一篇《多元文化結構中的儒學及其定位》,對此有所批評。所謂一元化思維,即學者們總是設想有個一元化的思想能夠提供其所需要的一切價值,而以此思維來觀看儒學,不免要發出種種責難:儒學能富國強兵嗎?能加強法制嗎?能發展高科技嗎?這種一元化的思維,其直接後果就是要求全盤改造儒學。陳先生對此一元化思維持一種反駁態度。他認為,儒學和現代文化的關係,需要我們從多元文化結構論的角度來看,亦即將儒學作為多元文化結構中的一環。換言之,就是在多元文化結構中來綜合設計儒學的定位、角色和發展。陳先生指出,儒學困境的解決出路,可以以這樣一種方式來考慮,即建構一個新的文化結構,調整儒學在新的文化結構中的地位,並和其他文化元素相互配合,從而使得整個文化系統不再表現出泛道德化。(按,學界常不乏學者以“泛道德化”來批評儒學。)如此,即使這個結構中的儒學的原有價值取向並不根本改變,也仍然不會失去它存在的理由。³ 陳先生正是因為把握到了儒學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意義,故對儒學在現代化的作用,始終寄予完全的信任和理解。而其致力於將儒學置於多元互動的整個中國文化現代建構中,綜合地設計儒學的發展,亦顯示出一番良苦用心。

陳先生顯然並不以為儒學是萬能的,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事實上,儒學對現代化的價值和意義,也不能僅僅從功利主義坐標來看。在今日中國,隨

3 參閱陳來:《多元文化結構中的儒學》,載《天津社會科學》1989 年第 1 期。

著市場經濟的繁榮，人們似乎出現了“一切向錢看”的迷失，社會上也不乏種種道德滑坡現象，社會道德秩序和個人安身立命的問題開始日漸突顯。當此之時，儒學文化和精神的價值意義正於此彰顯。陳先生認為，在這樣一個現代化的社會裏面，人的價值關懷、價值理想、人生意義，人的社會交往，都應被重新甚至給予更大的關注。而從這種關注出發會看到，儒家文化的繼承和轉化，對中國的現代化有重要的意義，它對現代社會可以產生良性的調節作用。陳先生在書中寫道：“儒家始終認為，以德治、用道德來引導，用非法律的手段來規範社會，使這個社會在有序的同時，成爲一個有羞恥心的社會，一個真正文明的社會。”（第 265 頁）

可以看到，陳先生作爲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但始終不失一種辯證理性思想，這是十分難得的。就本書來看，這種理性思想也是貫穿始終的。這裏隨意摘取幾例。如陳先生在書中道：“一個社會中國，工具理性提供動力，價值理性提供規範，二者加以配合，社會才能得到健康合理的發展。”（第 18 頁）“弘揚傳統文化不能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不斷學習西方文化。但有的東西是很難替代的，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就這不是外來的東西可以代替的。”（第 96 頁）“傳統文化復興不是傳統文化一家獨大，而是和現在已有的文化、自己創造的文化、其他優秀的文化一起復興。”（第 97 頁）也因爲這種理性精神，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陳先生在一系列文化討論當中，所扮演的一直是一個傳統文化領航人和守護者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隨著全球化討論的深入，陳先生開始廣泛呼籲建立全球化時代“多元的普遍性”。所謂建立全球化時代“多元的普遍性”，其總的原則是：從中國古代哲學的“理·勢”觀念出發，對全球化應採取“理勢兼顧”的態度，在參與中發揮東方的力量，促使其向更合理的方向發展。在文化關係方面，必須一改西方中心的文化理解，發揚中國的“和而不同”思想，確立“多元普遍性”的觀念，以作爲處理文化關係與文明對話的基本原則。陳先生指出：“在精神、價值層面，必須承認東西方各文明及其價值都具有普遍性，都是普遍主義，只是它們之間互有差別，在不同歷史時代實現的程度不同。正義、自由、權利、理性、個性是普遍主義的價值；仁愛、平等、責任、同情、社群也是普

遍主義的價值。”⁴ 在陳先生看來,只有建立起全球化中的“多元的普遍性”觀念,才能使全球所有文化形態都相對化、平等化,進而交流對話、互補互鑒。總的來看,陳先生是站在守護儒學價值文化的立場,力求古今、中西的匯通,即針對現代化理論,陳先生強調古代的智慧仍然具有現代意義;針對全球主義,陳先生強調東方的智慧同樣具有普遍價值。

就本書所收錄的文章看,其中還涉及一個主題,即陳先生對中國哲學本身以及中國哲學學科之建設的思考,我們這裏略作引述。

針對社會上一直存在的對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質疑,陳先生認為這種提法是有問題的,其根源還是因為把西方哲學作為一個標準。但陳先生指出:“歷史上西方哲學討論的話題和討論的方式並不是哲學之所以成為哲學的標準”,“西方式的理解是一種狹義的哲學,它是以一種西方的經驗,以西方人討論的問題來界定哲學。我們要發展廣義的哲學概念,要在世界範圍內破除那種在哲學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這樣做才能真正促進跨文化間的文化對話,發展 21 世紀整個人類的智慧。”陳先生強調,“‘哲學’必須是立足於人類全部文化的一個概念,各民族對宇宙、社會、人生、自然都有系統的理論思考,這就是哲學。在中國思想史上,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就是中國哲學。”(第 34—35 頁)陳先生的說法溫和理性,有理有據有節,具足慧識,十分值得賞嘆。另外,中國哲學學科自身的建設與發展,也是陳先生近年來持續關心的問題,因限於篇幅,筆者這裏不擬多作引述了,詳情可參閱本書所收錄的《什麼是中國哲學?》、《挑戰與使命》、《在今天這個時代研究哲學適逢其時》等文章。

作為當今最優秀的中國哲學史家、思想家之一,陳先生一直是儒學研究領域的旗幟性人物,《守望傳統的價值——陳來二十年訪談錄》一書的出版,其實正是他數十年守望歷史、關注現實的一次思想集結,單就此而言,此書已十足值得閱讀了。

(作者:廈門大學哲學系 申祖勝)

4 參閱陳來:《走向真正的世界文化——全球化時代的多元普遍性》。按,本書第二單元收錄有該文節選,可惜未為完整,全文刊載於《文史哲》2006 年第 2 期,此處引文據全文版引述。